

中州豪俠張鈞(三)

于凌波

中原大戰秘密使命

民國十九年，張鈞仍任代理河南省主席，致力於他的地方建設事業。而在這年三月，閻錫山策動馮玉祥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四十五將領，通電反抗中央，繼之閻錫山、馮玉祥所屬部將鹿鍾麟等五十七人，通電擁護閻錫山為「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」，馮玉祥、李宗仁、張學良為「副總司令」，四月一日閻錫山、馮玉祥就職（張學良報告中央未參加通電），晉軍進入山東，馮軍在河南，發動攻擊。中央迫不得已，於四月五日下午令討伐，於是爆發了民國史上最慘烈的一場內戰——中原大戰。

這場大戰自五月開始，到十月底結束，歷時六個月，戰線延長數千里，叛軍動員兵力六十萬，中央動員兵力一百萬以上。雙方傷亡人數逾四十萬，國家元氣為之大傷，而中原老百姓生命財產的犧牲，更是無從估計了。

戰爭開始時，河南省政府一度遷治歸德。戰事的重點在河南，身為代理省主席的張鈞，其責任之重、工作之繁，可想而知。十月三日中央討

逆軍收復開封，六日收復鄭州，馮軍崩潰，省政府才遷回開封。

十月五日河南省政府改組，中央任命劉峙為河南省政府主席，張鈞改任民政廳長。未久，張鈞受命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路總指揮，到豫南剿共，率師出發，留下了他未竟的水利事業。

在這一段時間中，尚有兩件事足以一述。一為十八年十二月，第五集團軍總指揮唐生智在鄭州叛變，通電與石友三相呼應，企圖自豫趨皖，與石友三部會合進攻南京；開封的唐部計劃逮捕與中央關係密切的省黨部負責人韓立綸，教育廳長李敬齋，水利專校校長陳峻峯及教授楊一峯等。事為張鈞所悉，在他全力掩護下，這幾位國民黨的忠實幹部，始能秘密離汴，脫離虎口。

另一事為中原大戰後期，張鈞曾奉蔣公介石秘令，微服赴河南滑川及安徽毫縣，說服馮部將領吉鴻昌、孫殿英等部歸順中央，有助於中原大戰的勝利。

剿共抗戰重總師干

民國二十年初，張鈞率二十路軍進駐河南潢

川，政府並任命他兼任豫南特區綏靖委員會委員長，負責此一特區的剿共工作。

豫南特區，包括了信陽、羅山、正陽、潢川、光山、固始、息縣、商城八縣。位居大別山脈的北麓。其中與湖南黃安、麻城縣境接連的潢、光、商、羅四縣南部的深山中，在民國十六、七年之間，為中共盤據，組織赤衛隊，成立紅軍第一軍，如燎原之火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這個區域的赤化，要自民國十四年說起，那時是國民二軍胡景翼任河南督辦，胡為老同盟會會員，國民黨組織這時得以公開活動，加以此時是聯俄容共，國共不分時期，大批中共黨徒也得以潛伏豫南各縣活動。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進駐豫南，各縣有不少男女青年，為黨務特派員所介紹，紛紛南赴武漢，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（第三分校設漢口）、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機構受訓，經教官毛澤東、譚代英等的引誘，加入共黨的為數不少。

民國十六年全國清黨，武漢地區這些跨黨份子不能立足，多數返回原籍，蟄伏鄉里。十七年夏，共黨在商城召開七縣代表大會，勾結商城民

團人員，劫持民團槍械，成立紅軍三十二師。十二月，商城城防空虛，匪紅軍攻陷商城，劫到槍械三百餘枝，成立紅軍第一軍，東擾安徽的六安、霍山，西擾光山、羅山及湖北的黃安、麻城，並佔據金家寨、七里坪等地作根據。

民國十九年，駐光山的少數部隊叛變，與中共合流；共軍有了機關槍、迫擊炮等新武器，如虎添翼，聲勢日大。更出擾豫鄂邊區各縣地方，中央先後會調派二十二路吉鴻昌所屬張印和、曹雲龍等三師之衆進剿，並任命李鳴鐘爲豫皖邊區綏靖督辦，但均剿撫無功，李辭職，二十年初二十二路軍調鄂北，由張鈞率二十路軍接防。

張鈞鑑於以往之失，採穩紮穩打戰法，剿撫兼施，地方暫時安定下來。

二月，張鈞先生免兼河南省政府民政廳長，改兼河南全省清鄉督辦。五月，委員長蔣公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，自兼總司令（副總司令李濟琛、參謀長曹浩森），任命張鈞爲中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。轄四個師：四十五師師長戴民權、七十五師師長宋天才、七十六師師長由張鈞自兼，新二十師師長卞子舉。這時豫鄂皖剿匪總部，調集各路大軍，分路合圍，向豫南皖北的匪區進剿，直到二十一年九月克復商城，十一月克復金家寨，此一地區匪軍始完全撲滅。二十二年鄂中鄂北匪軍次第肅清，接着二十二年五月贛南方面第五次圍剿開始，張鈞也率部入贛，參加了第五次大圍剿的戰團行列。

贛南井崗山的赤紅區，始於民國十六年。十六年政府全面清共，毛澤東在「兩湖秋收暴動」失

敗，竄至湘贛邊境的井岡山盤踞。十七年八月，朱德、賀龍等於南昌暴動後，也率領殘部到井岡山匯合，據爲叛亂基地；十八年政府曾派朱培德、何鍵兩次進剿，朱毛退出井岡山，流竄閩粵贛三省。四月發生桂系叛變，以致匪軍勢力迅速擴張，又在贛南建立了根據地。十九年底中原大戰結束，由二十年到二十三年底，政府大軍五次圍剿；二十三年十一月克復瑞金，共匪突圍而逃。

在贛南剿匪期間，張鈞於二十三年四月，調任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預備軍副總司令（總司令陳調元），這一次圍剿，蔣公擬定三分軍事、七分政治方針，並建碉堡以截斷共匪的交通，修公路以便利大軍的前進，步步爲營，節節前進，終於在二十三年底肅清贛南殘匪。共匪開始兩萬五千里流竄，到二十四年底，纔又在延安建立了陝北根據地。

江西剿匪告一段落，張鈞出任駐贛第七綏靖區司令官，綏靖殘匪、安撫流亡，重建滿目瘡痍的收復區。

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，與會中央執監委員一〇三人，代表四〇五人，林森主席主持開幕典禮，委員長蔣公作重要外交報告，謂：「和平未至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。在這一代表大會中，張鈞當選爲中央候補執行委員。

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張鈞以剿匪有功，得了幾座勳章：二十一年一月，政府頒發四等寶鼎

勳章，二十五年一月，復獲二等寶鼎勳章，七月，獲國民革命軍誓師十週年紀念勳章，十一月，獲三等雲磨勳章。

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全面抗戰爆發，在政府緊急動員之下張鈞出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，八一三淞滬戰起，出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部參加淞滬戰役。繼之移防蘇州，屢摧頑敵。上海戰役結束，張鈞調任第一戰區預備軍總司令，駐防許昌，整補部隊，並協助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將軍佈置河南防務。

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失陷，早在十一月政府已遷都重慶。二十七年元月，政府改組最高統率部，軍事委員會下設軍令、軍政、軍訓、政治四部及軍事參議院。二月，張鈞被特任爲軍事參議院副院長。

河南人尊稱大家長

抗戰時期的軍事參議院，類似後來總統府的戰略顧問委員會，副院長相當於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是一個較爲清閑的職務。張鈞自民國十七年二次出山，爲國宣勞十年，至此得以稍息仔肩，以後得有餘暇往返於西安、重慶之間。

張鈞的事業發端於陝西，視陝西爲其第二故鄉，亦素爲關中父老所尊敬愛戴。但河南爲其桑梓故里，河南人尊其爲：「河南人的大家長」，河南人的困難，張鈞必須關切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觀。因此，八年抗戰期間，接應豫省難胞，安置流亡學生，發動西北移民，都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。爲了收容豫省的流亡學生，張鈞特在西安辦了

一所西北中學，使流亡學生能够學業不輟。

河南自民國以來，兵連禍結，災荒不斷。而以抗戰開始後，到民國三十年前後達到最高峯。當時豫省災區，十室九空，餓殍遍地。民衆境遇之慘，不是生活在今日安定繁榮社會中的人所能想像。

廿六年抗戰開始，廿七年五月徐州會戰，日寇土匪原師團自黃河北岸南渡，襲擊豫東的蘭封、歸德；豫東大軍向豫西山地作戰略上的轉進，中央並決定黃河決口計劃，以期造成大規模的泛濫區，以阻敵西進。廿七年六月九日，鄭州附近的花園口決口成功，滾滾黃流，衝口而出，自中牟而尉氏、而扶溝、而淮陽，旁及鄰近各縣，造成了廣大的泛濫區，達到阻止日寇西進的目的。而泛濫區的居民，轉瞬廬舍沖沒、田園喪失，成了一無所有的災民。事後有人說，黃河決口，是「功在國家，患在地方」，只是身當其事的災民，情何以堪？

三十年、三十一年，河南連年荒旱，災區數月亢旱不雨，河流乾涸，井可見底，赤地千里，收成無望。而三十二年，繼旱災之後又來了蟲災——蝗蟲爲患。

說到蝗蟲的可怖，也不是我們今日工業社會的人所可想像。筆者三十二年，曾由陝西回豫西一行，到了洛陽、偃師、鞏縣等地，那時蟲災剛過去不久，道旁餓殍、時有所見。在路邊飯舖中吃飯，會有饑民竄入搶你手中的饅頭或鍋魁（饅頭燒餅一類）。鄉里父老稱，蝗蟲來的時候，在晴空萬里之下，驟然間呼呼有聲，繼之天色忽變

昏暗，有如狂風暴雨之將臨，民衆驚駭萬狀，奔走呼號：「蝗蟲來了，蝗蟲來了」。

於是男女老幼敲鑼擗鼓，打盆擊鍋，並奔到田間高揮衣物，向天吶喊。駐軍亦向空鳴槍，爲民助陣，企圖阻止蝗蟲降落。而一切措施，全然無效，片刻間飛蝗有如傾盆大雨，自空而下。霎時廣大原野，蝗積數寸。啃嚙禾稼、沙沙有聲。飛蝗過處，片葉不存。往往數百里原野，數小時間變成枯地、甲區吃完，轉往乙區肆虐。常於一日之中，數百里方圓，同時被災。

有些地區，蝗蟲過後，又來了幼蝗——俗稱小蚂蚱，小蚂蚱大如黃豆，不會飛，一蹦一跳，數量之多，有如長江之水，源源不絕。任何溝壕河川阻止不住它們。同樣的吃禾稼幼苗。看過電影「螞蟻雄兵」的人，可以想像出這種場面。

旱災、蟲災過後，繼之是賊盜四起，打家劫舍，搜搶糧食，都是爲了活命。

河南人就是在水災、旱災、蟲災、兵災相繼熬煎之中，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。實在活不下去，只有向西邊逃難——那時的東、北、南三面都是淪陷區——日軍佔領的地方。所以隴海鐵路火車頂上，洛潼公路的碎石路上，西逃難民絡繹於途，唯一的目的地都是西安。

這段時間，張鈞在西安設立難民收容所、流亡學生收容站，奔走呼籲，發動賑濟。三十二年蝗蟲災起，張鈞在陝變賣私產，購糧東運，救濟豫西災民——多年前筆者和張廣平談到這段舊事，據廣平說是將漢中所有的水田四十頃全部賣掉，作了賑款。

三十三年五月，日寇西侵，此即抗戰史上所稱的「中原會戰」，洛陽失陷，日軍攻近潼關，西安爲之震動。這時河南難民西逃的日以萬計。張鈞在西安竭力奔走，安頓食宿。並聯絡警察局，由全市警察以其名義轉告市民，每戶每夜蒸饅頭六斤，天亮送到救濟站。全市居民一致響應，無有誤者。若非張鈞先生平時德業之感召，何能臻此？

恤災救難移民新疆

張鈞在三十二年即籌劃向新疆移民，三十二年秋開辦「西北移民墾幹班」，招收有志青年，施以短期訓練，作爲移民幹部——筆者的早期同學好友宋書釗，即係以青年醫師身份考入墾幹班，帶領數百難民，到新疆墾屯區。中原會戰之後，難民大批湧至，即循原路一批批送往新疆。後來宋書釗的弟弟也以流亡學生身份逃到西安，要到新疆去「萬里尋兄」，我帶他找到了張鈞先生的次公子廣居，說明原委，廣居把他安置在難民隊中，完成了他赴新疆的志願。

說到流亡學生，戰時豫省學生流亡陝西者，先後以數萬計。尤以中原會戰之後，許多學校帶學生西逃，張鈞趕到龍駒寨——豫陝要道的中途站，籌集鉅款，發放旅費，照應學生們平安到達西安。

現在臺北的名歷史學者李守孔教授，當時是河南大學文史系的學生，他在七十年八月份的中原文獻上，寫過一篇「張伯英先生與河南大學」一文，茲摘錄數段，以見一斑。

「三十四年春，日軍復侵陷宛西各縣，河大師生自紫荆關徒步十餘日，到西安時真是精疲力盡，舉目無親，承伯英先生分別安頓在西北中學和中州會館，代籌救濟金，請西安市民趕製大餅饅頭，安頓分發，生活纔有着落。伯英先生曾假新城廣場召集豫省籍學生講話，他聲如洪鐘，以誠懇和藹態度，表示絕對盡自己一切力量，不使大家有凍餒之虞，勉勵大家雖在流亡中不可忘記讀書，要堅定抗戰必勝、建國必成的信心」。同年秋後，抗戰勝利，河大學生也是由張鈞出面協助，才復員返回河南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，李教授文中說：

「同年冬，因抗戰勝利，河大師生急於還鄉省親，以便明春在汴復課，而苦於旅費無着，無法成行。事聞於伯英先生，正巧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長馬傑，由渝赴開封履新，道經西安，拜候伯英先生，伯英先生乃請其以豫省善後救濟金資助河大師生。馬傑說：『陝西不是我工作區域，發放救濟金將不能報銷。』伯英先生說：『救濟要以人的籍貫為對象，而不該以地區作標準，你發放後報銷發生困難，我會代你向孔廬之院長解釋的。』就這樣河大師生的旅費解決了，大家高高興興的結隊凱旋而同。」

至於當年前往新疆的移民，先後到底移去了多少批、多少人，以及到新疆墾屯區以後的情形如何，可惜資料欠缺，已無從查考了。中原文獻「張伯英先生事略」中說：「使數十萬難民絡繹安抵蘭州、迪化等地，重獲安定生活。」數十萬之數不敢說，不過依其訓練墾幹班幹部人數的推

算，十數萬或二十萬人可能會有的。

熱心教育維護文物

張鈞先生熱心教育，獎掖後進，多少年對於豫籍學生的培育照顧，不遺餘力。李守孔教授的文章中有一段話說：「民國三十二年秋，我就讀河南大學文史系，聽教授們說：『伯英先生算是河南紳耆中，對河南教育最熱心的一位了。』」

事實上也是如此，張鈞先生在其故里鐵門鎮創辦有一所嵩嶽中學，培育鄉里子弟；民國十八年在其建設廳長任內，創辦水利工程專科學校，培育治河水利人才；抗戰時期在西安又創辦了一所西北中學，用以收容逃難到西安的豫籍學生。

至於照顧鄉里子弟，張鈞先生任川陝豫鄂邊區綏靖主任時，追隨他的一位參謀處長夏兆瑞，在一篇文章中說到：「卅八年十月（張公）駐重慶時，河南陷匪，男女學生成羣逃往川桂，流落街頭無以為生者頗衆，公聞之輒囑設法送款資助救濟，經筆者辦理者即有數起，受惠青年，賴以解除困厄者不知凡幾，其愛護青年學子，照顧鄉梓子弟，尤足稱道」。

民國三十五年夏，政府爲了提高學術水準，節省人力財力起見，要將國立黃河水利專校併入河南大學，地方紳耆不明真象，倡言反對，李守孔教授文章中說：

「河大田校長爲此某夜走謁伯英先生，向伯英先生分析水專合併河大的得失說：『你是河南人的大家長，你愛護水專，同樣也愛護河大，兩

所學校都和你有深厚的關係，你願見水專教授成爲大學教授呢！或是仍爲專科教授呢？你願見水專學生成爲大學生呢！或仍爲專科學生呢？河南水利建設人才水準提高呢！或是墨守現狀呢？』言猶未畢，伯英先生斷然的說：『伯蒼，你說的對極了，沒有人能像你分析的這樣透澈，我絕對支持水專併入河大，你放心去做吧！』伯英先生的從善如流，使反對之聲爲之消失。」

張鈞先生片言解紛，這只不過是千百件事例中的一件而已。一般人以爲張鈞出身軍校，參加革命，統率大軍，建節開府，是一位標準武人。事實不然，張鈞先生喜讀書，善爲文，平日生活簡樸，平易近人，禮賢下士，敬老尊賢，對顯達庶民一視同仁，從無富貴貧賤之分。愛部屬如子侄，士卒樂爲效命。輕財尚義，一諾千金。如此民主風範，求之於以往將領中殊不多見。此所以三山五嶽綠林豪俠，會黨人物，亦對張鈞仰之如泰山北斗也。

現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代河南省保存了一批文物，歷史博物館不時輪流展覽，這批文物中有關出土器物部份，與張鈞先生尚有一段淵源。

民國十二年，河南新鄭出土了大批古物，那時新鄭是北洋軍閥靳雲鵬佔據的地盤，靳雲鵬是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的弟弟，當時想將這批古物據爲己有。張鈞知道此事，與靳再三交涉，才將這批古物交河南博物館保存。這批古物廿六年抗戰開始後運到重慶，卅八年由教育部運到臺灣來，交歷史博物館代爲保管，今日才使我們有欣賞這批先民遺物的機會。